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兼论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皮 家 胜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皮家胜(1958-), 男, 湖北潜江人, 湖北教育学院政法系教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研究。

[摘 要] 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需要从“人类总体精神”这一视角去进行, 即从理解与解释何以可能这一视角去进行。同时, 也需要总结和概括以往马克思主义者在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丰富经验, 并从中获取有益启示, 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健康顺利进行下去并取得成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2-0156-0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并试图从解释学这一视角对它做些许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回应。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传播渗透着人类理解精神, 甚至不啻是一个较有意义的释义学范例, 这对于我们回答前设问题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因此, 我们也就有了将这两者置于一处加以讨论的可能, 或许它们会产生相互印证的效果。

—

一种理论、学说, 特别是哲学, 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度、民族之间传播开来, 不仅为其所在国家的人民所接受、为本民族所认同, 而且也能为他国人民所接受、为其它民族所认同, 其根本原因在于: 人类具有一种总体精神。只要一种理论、学说反映和体现了这一精神, 它就能为许许多多国家的人民和世界其它民族所接受和认同。而哲学, 正是以揭示人类总体精神的发生、发展为依归的, 因此, 凡以揭示人类总体精神为目的、且又的确从不同侧面和视角揭示了人类总体精神存在和发展状况的哲学, 就获得了声名远播的权利。

“人类总体精神”这一概念可从解释学中予以提炼。弗里德里希·阿斯特在谈到我们如何理解陌生的精神时这样说到: “存在的东西包含在精神中, 正如无限的光折射入千种从一个源泉而来的颜色中, 所有的存在只是折射入暂时东西里的大一(the One)的不同表现, 而所有东西最后再消融于大一之中。”^[1] (第2页)正因为所有的事物以及由对存在着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共同来源, 因此, 使得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狄尔泰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他把那个使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总体精神, 称之为“客观精神”, 我们接受它的熏陶, 从中吸取营养,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也才有可能通过它而相互理解并相互接受, “从我们呱呱坠地, 我们就从这个客观精神世界获得营养。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中介, 通过它我们才得以理解

他人及其生命表现。因为,精神客观化于其中的一切东西都包含着对于你和我来说是共同性的东西。”^[1](第97页)到了伽达默尔,狄尔泰的“客观精神”演变为所谓“效果历史”或“效果历史意识”,亦即意味着,当我们将各种事件和精神现象进行理解时,由以往历史沉淀下来的各种精神成果会对我们的理解发生效用,影响到我们当下的理解和各种理解活动。

“人类总体精神”首先是它的总体性,但这种总体性不是一个确定的“总量”,或有限数列的集合,毋宁说它是一个无穷数列的集合。因此,人类总体精神是发展着的,因而也是上升进步的。倘若它是有限数列的集合,那么,总有一个时间,它将静止下来,停滞下来,而一旦如此,它也就不可能继续随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前行,人类精神所获得的新成就将溢出这“总体精神”之外,所谓“人类总体精神”之说就失去其“总体性”涵义。因此,总体性就在于它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并兼包并蓄地将人类精神的一切成果开放性地统摄于其名下。总体性也表明,人类个别精神活动及其所获之成果都是这总体精神的一个部分,都将体现和反映这个“大一”的精神。倘若个别精神活动逸出人类总体精神,这个别精神现象就难以以为人们所理解而不得不被弃置,只有被纳入人类总体精神的精神活动和其客观化的事物才能被人类精神所理解,并融入这总体精神之中。

其次是其客观性。人类总体精神既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它不是某种先于自然、世界和人类而存在于某处的“原点”或“种子”,也不是抽象的、循环着的所谓“大一”,即不是所有存在都由其产生,而又复归于其中的神秘本原。人类总体精神就是人类存在之总体状况的精神表现,它具有客观的来源,它受人类存在之总体性的制约。不仅如此,个别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之是否能成为人类总体精神的一个部分,取决于它们能否对人类存在状况的改善有所助益,即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之需要。因此,人类总体精神也好,构成这一精神的各个部分也好,对其进行评价和权衡也就有了客观的尺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特别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是人类总体精神的真正反映者和体现者,它能够极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特别能够满足饱受苦难、盼望着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中国人民的需要。

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得益于我国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研究和传播,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人类总体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它代表着人类总体精神发展的方向,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必然易于为人类精神所理解。它不能像某些神秘主义哲学、概念哲学,也不可能像科学那样编撰出一些龇牙齧齿的概念和“人工语言”、“符号系统”,弄得许多人不明白。科学可以只使少数人懂,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却不能如此。哲学所使用的应是生活语言,是与人类的实践交往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系统,所以哲学就应当是晓畅明白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理解、进行解释,必须把握这一点。其次,要从整体和部分的结合上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部分的介绍、宣传、解释,一定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精神联系在一起,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精神,对它某一部分的理解就是不正确的。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使人们接受、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一并加以介绍和宣传,只有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才能变得深刻,对其作用、地位才能认识得更清楚、透彻。当然,这对解释者而言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解释者必须系统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其整体精神,而且也对每一个部分有全面、准确、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再次,要介绍、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具备很高的哲学素养,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不仅哲学素养和功底对于一个志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识之士极为必要,而且他还必须对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心理以及中国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因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要与对象、与语境相结合。考虑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对文本的一种“再造”或

创造性发挥,都会有所“溢出”,而真正的创造性发挥,乃是结合具体实际而进行的,因此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而言,他就不能单是解释者的身分,而应当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一样,为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的革命者。

二

理解和解释必以对“人类总体精神”有所体验和把握为前提,而“人类总体精神”又是对人类交往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着的状况的反映和写照,也是一种向着由交往共同体所决定的理想目标的趋近。因此,理解“人类总体精神”就需要不仅关注人类交往共同体的命运,而且要与其同呼吸、共命运,并实际地参与到为人类交往共同体之理想目标的奋斗中去,如此,才能把握“人类总体精神”之真谛,置身这一共同体之外,对其命运和前景不闻不问,就谈不上对“人类总体精神”之把握。

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突出反映和体现了“人类总体精神”的发展状况和趋向的伟大学说为目标的有志之士,必须有其自身对人类交往共同体的关切体验和奋斗经历,如此这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会方能入情入理、心领神会,否则,必然是隔靴挠痒,不着边际。李达,不仅仅是位通晓数国文字,有着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饱学之士或一般学者,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为人类交往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和获得自由而不懈奋斗的经历。他早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入东京第一师范学习理科,回国后组织反军阀政府的爱国示威活动,失败后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在很短时间,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向国内撰文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春,李达回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完成了一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从那时一直到去世为止,李达为追求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止。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种高度自觉基础之上的。当他试图为中华民族解放而采取实际行动并失败后,他开始潜心研究能够使饱受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翻身获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为武器,投入新的战斗。正是在这种斗争实践与潜心钻研的相互促进过程中,李达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凸显“人类总体精神”之伟大思想的理解,因而在向人们传播和阐释的过程中既能够释其精要,又能结合中国人民的急迫需要来进行,而且能够坚决地对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批判,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纯洁性。譬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脚点,又是当时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而当时的张东荪、梁实秋等基尔特社会主义分子又是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对此,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社会主义方向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以“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即“阶级斗争的手段”,这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2](第55,56页),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李达的分析和批判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清算,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透彻地了解到,只有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且在这一奋斗中产生了关于“人类总体精神”的体验和对其有所把握的人才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也才有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准确到位地宣传好马克思主义,并使之被其他人所理解。

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还在于他的通透性、系统性和实践性。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取得很大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发挥着一种示范性的作用。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研究的通透性既表现在他建国前撰写的《社会学大纲》上,也表现在他建国后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说上。《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撰写的一部系统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这部书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由于这部书的目的是自觉地为满足革命运动发展之需要、为革命者提供理论武器的,这从该著第一版的醒目题字:“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中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写作这部书的目的。1939年4月该著第四版中则更直接地说到,“……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因此,我特把这本书推荐给战士之前”^[3](第7页)。所以,晓畅明白就是必须具备的特点。即便不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也应当在把握精神实质的前提下,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加以阐释,否则,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当然,通透性不是指浅显、简陋,而是在于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由理论到理论,而是用中国化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透彻地予以阐释,这实际上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只有既精通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又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之表达功夫,且对国人之文化心理习俗有所了解的通达之士才有可能做到。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堪称典范。他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深理解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以贯之的唯物辩证精神为红线,以晓畅明白的语言平实清新的风格,宏大视野和条分缕析的细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为毛泽东“两论”作解时,李达以同样的精神和情怀,且以自己的丰富的历史、哲学史、科技史、自然科学以及实践斗争的经验材料对之进行了详细解释,既准确说明了原意,又对若干观点进行了发挥。正是李达和类似于李达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和潜心的工作,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铺垫下坚实的基础。

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使人懂,让人接受,而且必须系统化。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一种“文本”(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一种理论和学说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文本”)要获得理解并给以解释,必须进入所谓“部分和整体的解释学循环”,即我们对“文本”之整体的理解,必须以对部分的理解为基础和依据,而对每一部分的理解又必须以对整体的把握为前提,这是一种理解得以循环加深的良性发展过程。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作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通过循环来达到对它的真切认识,对于传播者,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介绍和阐释。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铁铸成的”,不能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前提、部分,否则,就有可能使之“失真”,就会离开客观真理^[4](第221页)。广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理论之间密切相联,要准确到位地传播、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介绍和传播,这对于人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极大帮助。李达在这方面做的一切,堪称楷模。仅1932—1937年间,他就发表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4部专著,《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多篇学术论文。他还先后发表过多种马克思主义法学、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著作。从李达宏富的著述和广阔的涉猎领域来看,他是力图从整体性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亦是放在整体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大背景上来进行的。惟其如此,李达在30年代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就其所“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5](第738页)。

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忌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有的放矢。要有的放矢,首先就要找到“的”、即靶子,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个“靶子”。我们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枝箭去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靶子”,惟其如此,才能满足革命和建设之需要,才能为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亿万人民所接受,才能真正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是各取所需。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我们做到两点,一是全面准确地掌握理论,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用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论去联系、指导实际,其结果可想而知;二是必须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和各种“境缘”,对它们不了解,势必会无的放矢,也肯定不会激起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和需求。再者,理论是抽象的,各种实际和“境缘”是具体的,如果对具体的实际和“境缘”不了解,试图用抽象理论去规范具体的实际和境遇,其结果就只能是削足适履。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走理论联系实际这条路,要走这条路,两件东西不可少,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精深研究,并准确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二是对中国实际的深入考

察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准确判断和理解。李达在这两点上均有长处。一是李达通晓四国语言文字,能直接从原文中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有较高的理论起点;二是李达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学知识,这使他能够从社会最根本问题入手,潜心观察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之状况,并能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解剖中国社会之性质,中国革命之目标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关系等,这些剖析和论述表明李达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全面的认识,这就使得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具有了很强的针对性和高度的自觉性。

总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有宏大视野,需要从“人类总体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这样一种角度去认识 and 把握,也需要总结和概括以往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所创造的经验 and 成功范例,且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and 鼓舞力量,以使我们能把握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并加快其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 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2] 李 达. 李达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3] 李 达. 李达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4] [俄] 列 宁. 列宁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陶德麟.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6).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Possibilit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PI Jia-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PI Jia-sheng (1958-), mal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ubei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 and studying as a doctor in Wu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School,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morality.

Abstract: To answer the possibilit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needs us to see this topic from a “aggregate human mental” point of view. which we could focus on the right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of this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we could summarize and generalize the former wealthy experiences created by other researchers and then take the advantage of what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our future study on this topic. so that we will have a lasting and smooth research which will brighten our future.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Sinicization; Hermeneutics